

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

陈银忠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摘要:在深入探讨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基础上,构建L-P修正模型进一步考察其存在性,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市场获取型的直接投资动机和直接投资结构的低技术格局。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加大对大陆生产性服务业直接投资力度以及加强两岸研发合作,是促进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产生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台湾;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

中图分类号:F8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8)05-0067-06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服务领域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台湾服务业发展开始步入缓慢发展阶段。为了提升台湾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重塑台湾服务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迫切需要台湾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为此,关于如何促进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议题,迅速成为两岸学界、政界探讨的焦点。台湾学者钱思敏(2013)指出服务业科技化和国际化是推动台湾服务业发展的突破之策。^[1]颜莉虹(2014)、谢国娥等(2016)等大陆学者也从国际化、推进两岸服务业合作等视角提出了台湾服务业摆脱发展困境的政策建议。^[2,3]同时,近年来台湾当局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2004年和2006年分别制定了“服务业发展纲领及行动方案”和“服务业产业升级转型计划”,并在2011年将国际物流、国际医疗等10个服务行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此后,2012年又提出了“三业四化”的产业提升方案。毫无疑问,无论是台湾政府当局的政策导向,还是两岸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均表明“服务业国际化”,即服务业“走出去”是推动台湾服务业转型升级,破解当前服务业发展困境的重要路径。

在两岸经贸关系日益正常化和制度化的背景下,基于优势互补,两岸在制造业领域上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但是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制造业发展已日趋成熟,两岸在制造业领域上的合作已经开始由单纯互补合作走向竞合关系。^[4]另外,随着大陆制造业产业链的逐步完善,两岸在制造业领域上的合作空间也正被逐渐压缩。但与此同时,当前大陆经济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亟需服务业的大发展,这为台湾服务业大举进入大陆创造了契机。据台湾“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统计,2013—2015年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额占台湾对外服务业直接投资总额的48.91%,^①大陆已成为当前台湾服务业“走出去”最重要的目的地。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技术溢出效应(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Coe和Helpman(1995)^{[5]859}、Lichtenberg和Potterie(2001)^{[6]490}的开创性研究后,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丰硕的研究

收稿日期:2017-10-23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项目“大数据智能化驱动下重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模式研究”(KJQN201800905)

作者简介:陈银忠(1978-),男,福建泉州人,四川外国语大学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①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台湾“投资审查委员会”统计数据库、台湾“主计处”统计数据库、历年《台湾统计年鉴》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经作者整理和计算。

成果。随着两岸经贸合作重点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两岸经贸合作的研究重点也开始转向服务业合作领域,但关于两岸服务业合作领域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探讨两岸服务业的合作现状及问题、两岸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较等方面,例如,吴凤娇等(2015)^[7]、夏杰长等(2016)^[8]、陈银忠(2017)^[9]等,而关于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纵观现有的研究文献,仍未有文献涉及该议题。在当前台湾服务业加速“走向”大陆的背景下,若能深入地研究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可以丰富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典型案例,还能够对深化两岸服务业合作,以及促进台湾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

二、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

自 Kogut 和 Chang(1991)^[10]首次提出 OFDI 逆向技术溢出理论假说后,学界开始对 OFDI 逆向技术溢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及实证检验。虽然目前在实证检验上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理论研究均认为,OFDI 对母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发达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地区之间。那么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如何呢?以下将结合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现况,对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进行尝试性分析。

大量研究表明(Griffith、Harrison 和 Reenen(2004)^[11]、Vahter 和 Masso(2005)^[12]、Branstetter(2006)^[13]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具体为:一是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的研发要素,降低研发成本;二是基于技术差距,获得规模经济以提高收益率。通过以上两个途径,发达国家能够获取丰厚的超额利润,而为了能够持续获得超额利润,会激励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以保持核心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台湾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早,其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要高于大陆。为此,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认为台湾是发达地区,而大陆是欠发达地区。这样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就可以认为是由服务业发达地区向服务业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为此,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类似。具体为:一是单位产品研发费用的分摊。台湾服务业大部分是由中小企业组成,规模较小,而且受制于岛内市场空间约束,发展空间有限,市场竞争激烈。大陆拥有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对大陆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基于两岸服务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台湾服务业可以迅速地获取大陆广阔的市场。随着服务业规模的快速扩大,将大幅地降低单位服务产品的研发费用。二是研发总费用的分摊。相较而言,大陆的研发要素成本较低,因此,台湾服务业企业可以将其外围的技术研发配置在大陆,以充分利用大陆的研发要素,以降低非核心技术的研发费用,使得母公司能够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配置更多的资源,提升对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三是利润返还。台湾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要强于大陆,因此,通过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台湾服务业企业能够迅速地占领大陆市场,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利用在大陆子公司的利润返回,将较大幅度地增加台湾母公司的总收益。为了保持对大陆持续的技术优势,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将激励台湾母公司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以提升母公司的研发能力。具体总结如下图 1 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Coe 和 Helpman(1995)^[5]⁸⁶⁰ 在 Grossman 和 Helpman(1991)^[14] 提出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研发技术溢出的基本检验模型,具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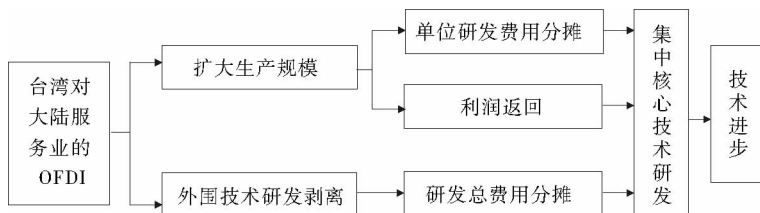


图 1 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

$$\log F_i = \alpha_i^o + \alpha_i^d \log S_i^d + \alpha_i^f \log S_i^f \tag{1}$$

其中, F_i 表示 i 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S_i^d 表示 i 国的国内研发资本存量, S_i^f 表示 i 国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 该检验模型也简称为 C-H 模型。由于该模型难以充分反映国际贸易的信息, 为此, 在贸易双方具有相同进口商品结构和研发资本存量结构的假设下, Coe 和 Helpman(1995)认为进口贸易与国内 GDP 的相关性越高, 国外研发的溢出效应就会越强。^{[5]862} 因此, 进一步将以上的模型修正为:

$$\log F_i = \alpha_i^o + \alpha_i^d \log S_i^d + \alpha_i^f m_i \log S_i^f \tag{2}$$

其中, m_i 表示 i 国进口额占 GDP 的比重。从而构建了基于国际贸易渠道的技术溢出检验模型。此后, Lichtenberg 和 Potterie(2001)^{[6]490} 对 C-H 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改进, 改进后的模型也称为 L-P 模型, 并利用该模型首次检验了 OFDI 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文章借鉴了 L-P 模型和赵伟等(2006)^[15] 的研究, 建立了考察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检验模型如下:

$$\ln TFP_t = \beta_1 + \beta_2 \ln S_t^d + \beta_3 \ln S_t^f + \epsilon_t \tag{3}$$

其中, TFP_t 表示第 t 年台湾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 S_t^d 表示第 t 年台湾服务业的研发资本存量, S_t^f 表示第 t 年台湾服务业在大陆的研发资本存量, ϵ_t 为随机误差项。

(二)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研究选取的样本区间为 1991—2015 年。台湾相关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1) 台湾服务业的产出、就业人数、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的数据来自于台湾“主计处”统计数据库; (2) 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数据来自台湾“投资审查委员会”统计数据库; (3) 台湾研发支出及三次产业数据来源于历年《台湾统计年鉴》。大陆研发支出及三次产业结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有的数据均转换成以 2011 年为基年的实际值。

1. TFP 的测算

参考以上相关研究文献的作法, 采用 C-D 生产函数来测算 TFP, 而关于服务业 C-D 生产函数的形式, 在此参考杨勇(2008)^[16] 的研究, 具体为:

$$Y_t = A_t K_t^\alpha L_t^\beta \tag{4}$$

其中, α 和 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Y_t 为产出, K_t 为资本存量, L_t 为劳动力数量, A_t 表示技术进步, 即全要素生产率。对式(4)两边取对数得:

$$\ln Y_t = \ln A_t + \alpha \ln K_t + \beta \ln L_t \tag{5}$$

变形得:

$$\ln A_t = \ln Y_t - \alpha \ln K_t - \beta \ln L_t \tag{6}$$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未知的, 因此无法利用样本数据估计出式(6)的参数 α 和 β , 在此参考大部分文献的处理方法, 假设服务业规模报酬不变, 即 $\alpha + \beta = 1$, 则有:

$$\ln A_t = \ln \frac{Y_t}{L_t} - \alpha \ln \frac{K_t}{L_t} \tag{7}$$

只要估算出式(7)的参数 α , 带入式(7)就可以求出 A_t 。根据式(4)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ln \frac{Y_t}{L_t} = \gamma + \alpha \ln \frac{K_t}{L_t} + \epsilon_t \tag{8}$$

由于无法获得台湾服务业资本存量的数据, 在此, 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 具体计算如下:

$$K_t = K_{t-1} + (I_t - D_t) / P_t \tag{9}$$

其中, I_t 为当年服务业名义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D_t 为当年的固定资产名义折旧额, P_t 为当年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于无法获取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在此以固定资产形成平减指数代替, 数据来源于台湾“主计处”统计数据库。关于基年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 Harberger(1978)^[17] 提出的稳态方法, 具体为:

$$K_{t-1} = \frac{I_t}{(g_t + \delta_t)} \tag{10}$$

其中, g_t 为第 t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率, 为了避免经济短期波动对测算结果的影响, 在此参考大部分文献的做法, 以考察期内产出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代替。现有文献在折旧率 δ_t 的选取上还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在此参考 Lee 和 Hong(2012)^[18]、王恕立等(2014)^[19] 文献的做法, 直接取 4%。根据采集的样本数据, 利用 OLS 方法, 得到参数 α 的估计值为 0.81, 进而利用式(7)测算出台湾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2. 台湾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

台湾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 同样采用永续盘存法, 具体为:

$$S_t^d = (1 - \sigma)S_{t-1}^d + RD_t \quad (11)$$

其中, S_t^d 为当年的研发资本存量, σ 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 在此, 同样参考大部分文献的作法, 直接取 5%, RD_t 为当年的实际研发支出。基年研发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S_{t-1}^d = \frac{RD_t}{(\nu + \sigma)} \quad (12)$$

其中, ν 为考察期研发支出的年均实际增长率。由于无法获取台湾服务业的研发支出数据, 在此, 利用研发支出数据, 根据式(11)首先测算出台湾研发资本存量, 然后, 通过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 换算成服务业的研发资本存量, 作为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

3. 台湾服务业在大陆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

在此, 借鉴 Lichtenberg 和 Potterie(2001)^{[6]492} 的计算方法, 并进行相应的修正, 得到台湾服务业在大陆研发资本存量的具体测算公式为:

$$S_t^f = \frac{SOFDI_t}{Y_t} S_t \quad (13)$$

其中, S_t 是 t 期大陆的研发资本存量, $SOFDI_t$ 是 t 期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 以历年累计额表示, Y_t 是第 t 期大陆的实际产出, 以 GDP 表示。由于无法获得大陆服务业研发支出数据, 在此同样采用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占比数据对大陆研发资本存量进行调整, 以此作为大陆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 而关于大陆研发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与台湾的一致。

(三) 实证分析

不平稳现象是时间序列数据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此, 采用 ADF 方法对变量 $\ln TFP$ 、 $\ln S^d$ 、 $\ln S^f$ 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具体的检验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ADF 平稳性检验结果

水平序列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差分序列	检验形式	ADF 统计量	结论
$\ln TFP$	(C, 0, 1)	-1.935	$d \ln TFP$	(C, 0, 2)	-4.056***	I(1)
$\ln S^d$	(C, 0, 1)	0.361	$d \ln S^d$	(C, 0, 2)	-3.938***	I(1)
$\ln S^f$	(C, 0, 1)	-0.469	$d \ln S^f$	(C, 0, 1)	-6.201***	I(1)

注: 检验形式(C, T, N)分别表示 ADF 检验中的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从表 1 的检验结果可得: 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单整, 说明这三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是不平稳的。而不平稳的时间数据间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 即协整关系, 为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在此, 采用 Johnson 方法进行协整检验, 具体检验结果如下表 2 所示。

表 2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特征值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P 值
None***	0.611	30.518	24.276	0.007
At most 1	0.333	11.645	12.321	0.065
At most 2	0.162	3.546	4.130	0.071

注: *, **,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表 2 的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 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协整关系, 即台湾服务业的 TFP、研发资本存量、OFDI 研发资本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 可以进一步估计

出协整方程。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表 3 协整方程的估计结果可得,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对服务业 TFP 有显著的影响,台湾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增加 1%,平均能够促进服务业 TFP 提升 0.176%。但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研发资本存量对服务业 TFP 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存在,该检验结果与主流观点并不一致。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是从投资动机看,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的动机在于拓展发展空间。受制于岛内有限的发展空间,以及人口增长放缓和产业转移,致使岛内对服务业的需求持续不足。为此,向外拓展发展空间成为台湾服务业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而随着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加速推进,依托两岸同文同种的优势,大陆自然而然地成为台湾服务业拓展发展空间的首选地。另外,由于两岸服务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的直接投资是属于服务业发达地区对服务业落后地区的直接投资,因此,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的动机并不属于技术获取型。由此可以清晰地判断,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的主要动机在于拓展其发展空间,以获取大陆广阔的市场,是属于市场获取型的,并且刘凯等(2015)^[20]的测算结果也验证了该判断。基于以上关于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分析可得,市场获取型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需要借助规模经济来实现研发费用的分摊,但规模经济的获取需要市场的有效扩大才能够实现。虽然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的规模快速扩大,从 1991 年的 20 万美元,增加至 2014 年的 36.11 亿美元,简单年均增长率高达 24.79%,但是截止 2017 年其 OFDI 存量的规模仍然很小。在分析期内,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存量占台湾服务业资本存量的比重仅为 0.46%,这说明目前台湾对大陆服务业 OFDI 的规模经济还未能显现出来,OFDI 逆向技术溢出的研发费用分摊机理还难以形成。

二是从投资结构看,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明显偏向于技术含量较低的生活性服务部门。据台湾“投资审查委员会”的统计,批发及零售业是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最大的部门,在分析期内投资比重平均超过了 35%,最高曾超过 60%。虽然近年来台湾对大陆的批发及零售业的直接投资比重有所回落,但如果加上住宿及餐饮业,在考察期内台湾对大陆在这两个服务业部门的平均投资比重超过了 45%。虽然随着 2009 年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的签定及生效,台湾对大陆金融业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开始大幅上升,但是在考察期内其平均投资比重也仅为 15.24%,而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部门的平均投资比重则仅为 5.68%。由此可知,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结构呈现低技术格局,是导致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难以显现的又一重要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尝试性探讨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理的基础上,基于修正的 L-P 模型实证考察其存在性,结果表明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基于市场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以及投资结构的低技术格局。因此,为促进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加快产生,助推台湾服务业加速转型升级,以及两岸服务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表 3 协整方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ln S^d$	0.278*** (0.049)	0.176*** (0.034)	0.178*** (0.033)
$\ln S^f$	-0.012 (0.013)	0.005 (0.007)	0.003 (0.006)
C	-1.799*** (0.283)	-1.090*** (0.206)	-1.172*** (0.209)
AR(1)		0.598*** (0.140)	0.668*** (0.111)
F 统计量	127.632	265.567	303.745
Adj. R ²	0.923	0.975	0.978
DW 统计量	0.436	1.956	1.914

注:括号数字表示标准误,*、**、***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第一,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大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内容,台湾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是当前台湾加大服务开放的重要政策。为此,台湾应借此契机,加强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经济示范区服务业对接合作的顶层设计,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发展模式,促进台湾服务业加快“走向”大陆,推动两岸服务业合作向纵深化方向发展。

第二,优化直接投资结构。台湾对大陆服务业直接投资动机应从单一的市场获取型转向市场与技术获取并重。在强调对大陆生活性服务部门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应高度重视加大对生产性服务部门的直接投资力度,特别是研发、设计等部门的直接投资力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是当前两岸产业发展的着力点,通过深化两岸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可以加速两岸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增强两岸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强两岸研发合作。台湾服务业企业应将外围技术研发部门更多地转移至大陆,以利用大陆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成本,降低其非核心技术的研发成本,使台湾服务业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配置至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增强其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随着大陆创新型驱动战略的有力推进,近年来大陆在研发领域上取得较快发展。因此,通过加强两岸在研发领域上的合作不仅能够加速大陆研发领域的发展,还能通过两岸研发领域合作的不断深化,依托充裕的研发要素,大幅地提升两岸的研发能力。

参考文献:

- [1]钱思敏. 推动服务业朝科技化与国际化发展之困难与突破策略[J]. 台湾经济研究月刊(台湾),2013(4):5-12.
- [2]颜莉虹. 21世纪以来台湾服务业发展概况及其发展趋势[J]. 台湾研究集刊,2014(3):64-74.
- [3]谢国斌,莫晓洁,杨逢珉. 台湾地区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6(2):124-134.
- [4]李月,周密. 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与产业政策的协调[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6):59-66.
- [5]COE D T,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
- [6]LICHTENBERG F R, POTTERIE B P.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3).
- [7]吴凤娇,陈忠. 海峡两岸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比较及合作对策研究[J]. 国际贸易,2016(8):60-66.
- [8]夏杰长,齐飞. 两岸服务业合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国际经济评论,2015(5):142-155.
- [9]陈银忠. 海峡两岸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及竞争力分析[J]. 长沙大学学报,2017(1):26-31.
- [10]KOGUT B, CHANG 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1,73: 401-413.
- [11]GRIFFITH R, HARRISON R, VAN REENEN J. Technology sourcing[R]. Royal Economic Society Annual Conference, 2004, No. 12.
- [12]VAHTER P, MASSO J. Home versus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R].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Series, 2005, No. 820.
- [13]BRANSTETTER L. I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hannel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Japan's FDI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6,68: 325-344.
- [14]GROSSMAN G, HELPMAN E. 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91:150-170.
- [15]赵伟,古广东,何元庆. 外向 FDI 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 管理世界,2006(7):53-59.
- [16]杨勇.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J]. 世界经济,2008(10):46-55.
- [17]HARBERGER A C. Perspectives o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ARTIS M J, NOBAY A R.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Croom Helm,1978: 69-151.
- [18]LEE J W, HONG K.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determinants and prospects[J].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12(2): 101-113.
- [19]王怒立,向娇娇.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4(9):109-119.
- [20]刘凯,彭小雨. 母国特征、FDI 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6):118-126.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uburb in the New Era: Practice, Problems and Trends

——Investigation on the Practice in the Suburban Village X, County B, City R

LI Zengyuan, YIN Yanju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Rizhao 27682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into a new era,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rural are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anwhile,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uburb, which is the central link betwee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is of crucial significance too. The practice in the suburban village X, County B, City R shows that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has made some progress, but it still faces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perty right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economic operation after reform as well as village management. These problems result from many factors, such as, market restrictions and risks, lack of complete and effective risk-sharing mechanism, and poor coordina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uburb,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the separation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community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classified management of economy and to establish market risk sharing mechanism. Meanwhil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the rural collective and the residents and to guarantee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residents in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In addition, it is also essential to build a modern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 in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thus improving grassroots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suburb; refor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commun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governance

(责任编辑:魏 霄)

(上接第 72 页)

Research on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Taiwan's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to Mainland

CHEN Yinzhong

(Research Center for Country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orough discussion of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mechanism of Taiwa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 industry to mainland,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its existence through the L-P revi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he main reasons of which are the investment motivation of market access type and low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investment pattern.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innovating the service cooperation model, increasing the direct investment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ross-strait R & D cooperation are the important paths to promote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Key words: Taiwan; service industry; OF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责任编辑:魏 霄)